

書評

失控的未來：揭開全球中產階級被掏空的真相

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劉泰廷 *Tai-Ting Liu*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Doctoral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008年，台灣和國際環境皆有重大變動。就台灣而言，國內經歷二次政黨輪替，實現已故學者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民主發展理論，持續朝鞏固民主政體一途發展。由於經濟發展隨著外部競爭而陷入困境，新政府被期許能帶動台灣經濟的活力，並恢復中斷多時的兩岸協商，創造利於國家未來發展的政治經濟環境。不幸地，在理想與現實終究有落差的情形下，新的政治環境並沒有將台灣帶上蓬勃發展的坦途，由美國次級房貸所引爆的全球經濟衰退，使台灣未能在新氛圍中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成長雖然不是一夕間可達成的目標，但是國際環境的惡化使急需活水的台灣面臨經濟持續低迷的厄運。就國際關係而言，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有兩項重要啓示：自由資本主義的矛盾和美國霸權的衰退。

全球化是冷戰後對人類生活造成深刻影響的衝擊之一，而其中富有強烈的自由主義意涵。「歷史的終結」告訴我們，自由主義從冷戰意識形態鬥爭中的脫穎而出，並意味著自由民主是全體人類政治上的共同憧憬，自

由資本主義是實現人類福祉的不二法則，兩者相輔相成，而美國作為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典範自然是自由主義的最佳提倡者。¹作為後冷戰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實力長期傲視群雄的超級強權，美國以自身成就為傲，並透過戰後建立的布雷敦森林體系在全球化時代維持自由秩序。九〇年代中期的亞洲金融風暴已經使國際社會發覺資本主義可能的內在矛盾，十年後的經濟衰退只是更突顯矛盾的事實，使習慣與沉浸在自由主義繁華下的人們，終於對環境動盪有所警覺。加上美國在中東地區反恐未果，以及金磚四國崛起開始影響國際間的權力分配，種種因素皆使「後美國世界」的討論此起彼落。²

作為長期觀察全球化發展和世界格局變動的當代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對全球經濟環境的動盪有精闢的見解。「失控的未來」是史迪格里茲針對全球經濟發展進行探討的第四本專書，³而延續全球化的主題，有別於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對全球化世界的樂觀描述，⁴作者從批判性的角度出發，挑出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病。書中第六章的標題「貪婪時代，小民受害」扼要地點出全書的重點和資本主義的問題，即人性無窮盡的欲望；原文標題「Avarice Trumps Over Prudence」，亦即「對財富的貪婪，壓倒遠見」，更一針見血地指出人性的貪婪。後冷戰世界雖然建立在美國維持的自由秩序上，但自由主義僅僅是披在人類現實主義上的薄紗，往往掩飾人性欲望作祟、貪得無厭的一面，製造欣欣向榮的假象。政客追求權

¹ 見：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台北：時報，1993年)。

² 見：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杜默譯，《後美國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台北：麥田，2008年)。

³ 前三本分別是：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台北：大塊，2002年)；齊思賢、張元馨譯，《狂飆的十年：一個繁華盛世的興衰啟示錄》(The Roaring Ninetie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台北：天下文化，2005年)；黃孝如譯，《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破解全球化難題的經濟預告》(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台北：天下文化，2007年)。

⁴ 見：蔡繼光等譯，《了解全球化》(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台北：聯經，2000年)；楊振富、潘勳譯，《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台北：雅言，2005年)。

力的極大化，資本家追求財富的極大化，而當兩者進行利益交換以各取所需時，不屬於任何陣營的普羅大眾是這樁交易中直接的受害者。作者花了大量篇幅在書的前半部描寫經濟衰退的始末(仍持續發酵中)，敘述政府和銀行如何互相扶持、撐起瀕臨崩潰的美國經濟的故事，以及許多人在過程中如何成爲最無辜的犧牲者。

故事起始於美國國內信用的過度延伸和各式別出心裁的衍生性金融商品。隨著電腦和通信技術在九〇年代中期的發展，由網際網路帶動的投資潮(dot-com boom)是後冷戰時期突顯「自由資本主義勝利」的劃時代代表徵之一；全球金融體系的革命性發展開啓大規模的投機潮。金錢隨著網際網路的觸角流轉到世界各地，國家疆界作爲阻絕外力的屏障已逐漸失效。科技業欣欣向榮的景象使大量的「熱錢」湧入股票市場和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而美國股市的飆漲使投資者逐漸將「網路」和「利潤」畫上等號，不問公司的實虛便一頭栽入。經理人推出各式各樣的金融商品，吸引躍躍欲試的投資者，每個人都想在泡沫中分一杯羹。網路泡沫破滅以後，股市的崩盤將眾投資者帶回現實世界，有些人提早離開，得以全身而退，有些傾家蕩產，有些則收起之前的興奮，強打起精神回歸昔日的平淡生活。

輾轉至 2008 年的次級房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投資者對市場持有的過度信心再次撼動美國經濟。危機建立在對房地產市場的高度期待上，而宛如所有的泡沫一般，過分的期待促使大量的熱錢流入，當市場的走勢突然逆向發展時，大規模的恐慌即導致經濟危機成爲自我實現的預言。進一步而言，所謂的「次級貸款」是針對「再次貸款」的借款人所發放的款項，而依照國內綜合標準評估，這些借款人的能力不足以還清貸款。然而，在房市榮景下，許多銀行紛紛提供優惠利率、鼓勵借款人再借貸，而借款人也在「專家」的說服下就範，兩者共同的特徵是對市場充滿無比的信心。當房價急轉直下時，大量的房貸成爲「呆帳」(bad debts)，許多銀行在債務不得回收的情形下瀕臨破產，而以房利美公司(Fannie Mae)

和房地美公司(Freddie Mac)為首的諸多房貸公司，亦面臨垮台的危機。由於「二房」為美國最大的房貸公司，其倒閉對美國經濟可能造成的衝擊不言而喻，股市的震盪可說是較早發生的現象而已。

儼然是網路泡沫翻版的次貸危機，就美國大眾而言，某種程度上較前次危機造成的傷害更深，對經濟發展影響更大。史迪格里茲強調，「投資必有風險」是可以被接受的事實，但是當銀行家「過火」的行為危及經濟的正常運作，並且要以社會全體的經濟福祉為代價時，是完全無法獲得大眾認同的不道德。以「大到不能倒」形容受此次危機襲擊而面臨倒閉的銀行和企業，⁵歐巴馬政府的對策是透過龐大的預算承接債務、進行財政紓困，而其中不乏銀行和企業的大力遊說。姑且不論錢從何而來，最終必然犧牲國庫和社會福利。書名所指的「中產階級被掏空」，在於政府透過更大的開支挹助銀行業並承接債務的同時，銀行及企業主管和經理人依舊坐擁高薪和年終獎金，成本必然反映在大眾稅收。無論政府是否提高稅率以因應危機，此現象造成的社會成本極為昂貴，因為大眾對失業、物價上漲、存款萎縮等感受深刻，銀行和企業界的「蓬勃」現象僅會造成民眾的心理失衡，政府的紓困作為則會進一步激起懷疑和抨擊。

就金融海嘯造成的直接衝擊而言，許多次級房貸借貸人面臨的是流落街頭的危機。由於借貸人原本就無力償還借款，房市崩塌的影響是過多呆帳導致房屋被查封，而多餘的投資又波及許多借貸人已抵押的住屋，結果即是血本無歸，資產全部在海嘯中被吞噬。所謂擁有穩定工作並透過個人努力換取汽車和房屋的「美國夢」(American Dream)就此破滅，因為不景氣一方面導致大量裁員(尤其以汽車等傳統工業影響最大)，一方面更剝奪許多藍領階級家庭的唯一資產 --- 住屋。美國夢所營造的理想生活在一連串的連鎖效應下顯得諷刺，美國引以為傲的自由資本主義良方似乎呈現的

⁵ 安德魯·羅斯·索爾金(Andrew Ross Sorkin)著；潘山卓譯，《大到不能倒：金融海嘯內幕真相始末》(Too Big to Fal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 and Themselves) (台北：經濟新潮社，2010年)。

是，經濟體制只對富有的銀行和企業家有利，無論其如何欺騙和浪費投資人的錢，社會大眾永遠是最大的輸家。許多家庭淪落街頭突顯的是美國夢的虛假和嚴重的貧窮問題，而貧窮必然衍生更多的犯罪和治安問題。

作者曾提出「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概念，抨擊大眾經濟學的錯誤假設。完全競爭市場在某種程度上誤導許多人對經濟運作的理解，未能體認在個人競爭條件不平等的情形下，大型企業和銀行家等足以影響經濟結構者，往往是資本主義體系中最大的贏家。實際上，個人在現實世界中掌握的經濟資訊是不同的，因此對體系擁有充分資訊的個人自然佔有相對優勢。透過對體制的把持，有能力影響結構的個體便得以透過制定規範把資訊上的優勢化為絕對優勢。此種體系對原本就落後的個體的影響是造成結構上的限制，不僅導致「相對貧窮」，也導致「絕對貧窮」的困境。換言之，由於資訊不對稱，自由經濟也不存在公平競爭，而倘若持續信奉自由放任主義的原則，其中必有部分的社會公義被犧牲掉。當多數人接受自由經濟學並認為自由放任即是真理時，諸如貧富差距等問題很容易被忽略，企業和銀行家等體系中的既得利益者更會將問題輕描淡寫。美國次貸危機反映的即是資訊不對稱的現象。

隨著美國經濟的動盪以及中國的經濟崛起，美國霸權式微的言論在世界各地盛囂塵上。美國的霸權地位主要建立在軍事和經濟等兩根支柱上，因此在陷入中東戰場的泥淖之後，國內經濟失靈似乎也暗示其霸主的寶座即將拱手讓出。在經濟作為後冷戰時期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的情形下，美國的經濟發展備受矚目，因為其長期以來身為國際發展的引擎，發展停滯或衰退必然對全球經濟體系造成重大影響。不僅全球經濟發展可能受美國國內動盪牽連，更深刻的影響是自二戰以後建立的布雷敦森林體系。美國的經濟霸權反映在傲視群雄的 GDP 以及美元作為主要的國際計價通貨等兩項條件上，因此美國經濟的不穩會嚴重影響全球貿易。貿易是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的重要一環，若美國喪失足夠的能量維持開放的國際體

制，結果可能是國際間再度掀起保護主義浪潮，回到「競相沉淪」(race to the bottom)的重商主義年代。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三大組織也可能隨著美國的退位而影響力銳減，使全球經濟體系重新進入無政府狀態。

如強大的軍事力量所象徵的，美國的經濟力量代表的是國際秩序，而秩序無疑是貿易得以蓬勃發展的必要因素。美國柯林頓政府在 1990 年代將其經濟政策塑造成「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倡導自由貿易市場、預算收支平衡、完全就業等，遂成爲後冷戰時期國際間主流的經濟意識形態。次貸危機代表的是華盛頓共識的缺陷，因爲不是所有人皆可從中獲利。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已警示各國關於自由資本主義的盲點，國際貨幣基金在危機中的作爲重創美國的國際形象。2008 年的全球經濟衰退再次突顯資本主義的問題，其中原因同樣在於過熱的投機心理和會計弊病，而紙終究包不住火，使得華盛頓共識再次受創。兩次的打擊應該給予美國足夠的反省空間，檢討自由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並考驗執政者進行改革的應變能力。反之與美國較勁的是中國式的專制資本主義或「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危機若再次發生，必然使自由資本主義蕩然無存，全球再度陷入群雄興起的混沌。